

困者之舞

王列耀 颜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四十年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饶芃子 主编

困者之舞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四十年

王列耀 颜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饶芑子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者之舞：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四十年/王列耀，颜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6380 - 1

I. 困… II. ①王…②颜… III. 中文 - 文学研究 - 印度尼西亚 IV. I34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8720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困者之舞——1965 年以来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	(1)
第一章 特殊语境与文学书写	(12)
第一节 尴尬岁月	(12)
第二节 交织与对抗	(18)
第三节 想象与建构	(21)
第四节 集体的声音	(25)
第二章 我是谁:微妙的隐喻	(33)
第一节 主人或继子	(33)
第二节 记忆与遗忘	(45)
第三节 流浪? 追寻?	(53)
第四节 本土爱情与华族隐喻	(64)
一 本土爱情	(65)
二 华族隐喻	(67)
三 叙事策略的选择	(68)
第三章 故乡:永远的叩问	(71)
第一节 隔海的“梦乡”:老一辈华人的“故乡”	
叙事	(72)
一 父亲与父亲的故乡	(73)
二 故乡、异乡与“船”	(77)
第二节 双重的家园	(87)
第三节 “故乡”的乌托邦色彩	(99)

第四章 中国:隔海的想象	(103)
第一节 变化中的“中国”影像	(103)
第二节 永远的“漂流者”	(111)
第三节 古典中国的意义	(120)
第五章 历史的映象与新世纪的探寻	(131)
第一节 华侨文学的坚持者	(131)
一 中国意识:重要特征	(133)
二 现实主义:主要创作手法	(136)
第二节 南洋离乱的历史笔记	(140)
第三节 转型期的华侨心态	(152)
第四节 新世纪文学中的“吾国吾民”	(158)
第六章 异族叙事:身份的建构与混杂	(169)
第一节 异族叙事与华族特质	(170)
一 异族想象的一般模式	(173)
二 双重肯定的言说策略	(177)
三 叙事中的潜在偏见	(180)
第二节 异族叙事与华人的“国家”认同	(184)
一 异族习俗叙事与华人国家认同的建构	(185)
二 异族叙事与华族的本土责任感	(190)
三 叙事话语的模式化	(193)
第三节 黄东平的异族叙事	(196)
一 异族形象的类型	(197)
二 异族想象的独特模式	(202)
三 异族意识的含混与模糊	(204)
第七章 都市进程与异族叙事	(207)
第一节 异族叙事与华人的诗意空间	(208)
一 乡村的诗意内蕴	(210)
二 乡村与原乡的叠合	(213)

三 乡村诗意的铸造方式	(217)
第二节 异族叙事与华人的文化危机	(219)
一 异族形象之一:文化变迁的镜像	(219)
二 异族形象之二:对传统的质疑	(221)
三 异族形象之三:传统的诗意化	(225)
第三节 差异叙事——可能丢失的记忆	(228)
第八章 女作家的边缘写作	(231)
第一节 写作背景与身份	(231)
第二节 写作意识:“家”、“群”、“和”	(236)
第三节 轻盈的风格	(246)
第四节 袁霓与简嫔散文比较	(253)
一 乡村与童年记忆的重构	(253)
二 女人与男人的尘缘	(256)
三 佛与我的对话	(258)
附录1 首届印尼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文学部分综述	(262)
附录2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专书一览	(266)
主要参考书目	(271)
后 记	(276)

前言 困者之舞——1965 年以来的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家，也较少出现在世界华文文学创作者、研究者交流与互动的国际性舞台上。

近十年来，这种互为“疏离”的现象，已有较大改观。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举办了两次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专题国际研讨会，向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界较为充分地展示出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正宛如一位百折不挠、艰难跋涉、不断成长的强者和智者的“面容”；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一员，作为印度尼西亚多民族文学的重要一员，正在逐渐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

一 命名之思：什么是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对此，智者各抒己见，议论纷纷。正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这个时代，不一定要以《红楼梦》、《高老头》作为文学的标准，一份演讲词、一张列车时刻表、一条短信，只要能激发想象、寄托情感就可能成为文学范本。如今，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观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但一落实到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些人又可能倒退了几步，冷嘲热讽者有之，不屑一顾者有之。对于印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也存在此种成见。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他们的文字一样是其灵魂和情感的结晶，一样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瑰丽诗心，我们又怎能将其排斥在文学之外呢？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创作者，首先是凭着热情与信念在写作，他们没有太高的目标，与荣誉和鲜花无缘。如果说“言志缘情”乃文学创作的最终动力和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无疑也是富有文学特性的。在这样一种写作中，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以文学团体和华文写作为纽带，这些写作者形成了一个小世界。通过这一交往和沟通的平台，他们沉浸在族群文化的美丽之中。而他们创作出来的华文作品，题材大多关乎日常生活，体裁以随感、随笔为主，文笔也朴实无华、不加润饰，因此，与其说他们在写作，不如说在过一种团体生活，文学既是他们的舞台又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在现代社会“狂欢”的梦幻场所。在康德、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看来，文学的最大魅力与社会功用都在于其“梦幻性”，展现与现实迥异的“乌托邦性”，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也极大地展现了文学的这一特性，在这里，“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创作理想甚至得以同时呈现。因此，把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还在于，通过展示文学自身的魅力，我们可以对“什么是文学”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

在印度尼西亚，近四十年来，从事华文写作的绝大多数是华人，不是其他族群；而华语在东南亚本身就是华人族群的一个独特标志。他们不是沿用“汉语”，而是选择“华文、华语”来命名族群语言；命名的差异，已经划出了一个属于东南亚华人类群的想象空间，标示出他们作为华人离散族群及其后裔的异域生存经验与独特历史。换言之，由于印度尼西亚华人独特的历史遭遇与现实处境，才导致其文学表述与中国汉语文学有着不同的表现，依借“华人”这一视角，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才

得到凸显。由此，“印度尼西亚”，就不单指一个国家或地理因素，而是综合性的语境因素，正是这一综合性的语境因素，对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形成与个性呈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 政治魅影中的文学轨迹

从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划分来看，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归属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但是，由于特殊的国情与语境，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从“面容”到“内心”，都充满着自己的个性，在与本区域华文文学表现出某些相似性时又蕴含着许多差异性。

纵观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可以觉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它的兴衰与当地华人社会的沉浮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印度尼西亚，很多时候，文学与政治构成了一种立竿见影的互动效应。原因何在？在国家内部，少数族群的写作权利是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直接相连的。印度尼西亚华人作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族群，其“华文写作”也深深地烙上了“政治的伤痕”。在20世纪以来动荡不安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华人社会在政治变动中屡遭变迁，这些变迁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吴奕锜在《印尼华文文学历史发展述略》一文中所梳理的一样，从抗日战争、苏加诺领导的“八月革命”到1965年的“9·30”事件，这些深刻影响印尼社会的政治事件，也是印尼华文文学出现阶段性变化的直接原因。^①可以想象，脱离了风雨飘摇的社会变迁历史，作为少数族裔文化符号的华文文学又该变成怎样的“空中楼阁”呢？

印度尼西亚独立前，虽然也有一些本土意识较为显著的华文

^① 吴奕锜：《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历史发展述略》，《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作品，但印度尼西亚华人大都是华侨身份，主要展现为“身在印尼心向祖国”的情结，其文学创作基本上可归入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习惯上可称之为华侨文学阶段。独立初期，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中国的关系较为友好密切，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政府妥善处理了有关华侨双重国籍的问题，再加上两国在发展中的一些共同取向，关系较为友好，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因此，当时，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在题材、内容到创作方法上都与中国大陆文坛关联甚深，有时甚至跟着国内的某些思潮走，无法凸显其独特性。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坛出现变化，其对华政策也不断动摇、反复，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处境开始变得尴尬，华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也受到一些影响。不过，之前所酿就的文学生产条件仍能对创作产生持续影响，在一些热心人士如梁披云、林琼光、邹访今、周颖南、黄裕荣等人士的协力推动下，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围绕原有的轨道继续发展。除了报纸副刊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阵地之外，由周颖南、林日顺等倡设的“翡翠文化基金会”以及“翡翠文艺奖金征文比赛”和几次全国性的印华学生作文比赛的举办，也推动了这一时期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在此期间，一大批文学作品和文艺人才涌现出来，如白流、冯世才等人的《盗火者的爱情》，曾宣、黄东平等人的《青春火焰》，钟子、林立等人的《万隆孩子》，坚学、马雄等人的《盼望》，张运秉、文晟等人的《雾海笛声》，李旭、立人的《锡岛恩仇记》（电影文学剧本）、刘朱和的《黎明之歌》，冯世才的《明朗的日子》，黄裕荣的《春风的波浪》和《印华文艺评论集》等等。^① 这些文集，集中地展示了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在中国影响

^① 吴奕錡：《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历史发展述略》，《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与本地化的张力间焕发活力的情形。

“9·30”事件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尽管在相近的历史时期，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先后掀起过“反华”的浪潮，但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更为严重。当局采取了极端的反华、排华政策，印度尼西亚华裔华人陷于从天而降的空前劫难之中。一方面，中国和印尼关系趋向全面恶化，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被割断，很多华侨被迫“归顺”印度尼西亚本土，两国间的文学借鉴和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本土，除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和抢劫等短期行为，更为持久深刻的影响在于对华族文化根基的全面摧残。华人社团、华校、华文报纸都被逐一取缔，华文书籍包括图书馆与个人藏书也被焚毁，来自任何地域的华文书报刊物都被严禁进口，甚至连偶尔使用方块字也可能危及华人的生命，全国只剩下一份由印尼当局情报部门督办的半中文半印尼文的《印度尼西亚日报》，“此时的印尼，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更不用说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了”。^①在这段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岁月里，文学正如沙漠上的小草，无法茁壮成长发展。绝大多数写作者迫于各种压力放弃了华文写作，整个华文读者群也逐渐消遁。当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缓和，一些人重新拿起写作之笔时，他们所面对的已是十分恶劣的文学生产场域，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难以填补的空白地带。

正是这一“事件”造成的时空断裂与差异，使得60年代末以来的印尼华文文学处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中。直接而强烈的政治压力持续破坏着文学赖以存在的语言文化之根，使得这种文学的重新复活之路尤为漫长，并宿命般地永远染上了旧时代的心灵

^① 吴奕锜：《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历史发展述略》，《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梦魇。换言之，二十多年的严酷打压，三十多年的历史断裂，使得印尼华文文学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相比，有着更为曲折的发展道路，带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这将强烈影响印尼华文文学创作的立场、方法和表现形式，由此也赋予了印尼华文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品质。因此，侧重关注“9·30”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文学也是凸显其独特性的一个策略，并希望在洞察、呈现这种独特性时，能够证明它的历史与现时价值所在。

照詹姆逊的理解，第三世界的文学写作都是民族寓言的形式，都体现了某种政治的利比多因素，那么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写作，作为第三世界内部的种族矛盾的折射，也是必然。它与华人族群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政治高压下的处境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政治压力造成的危机是多重的，生存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想象的，难以言尽，这些势必折射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创作实践中。有些论者曾经论及印度尼西亚华文创作中的某些问题，如语言的平淡、题材的重复单一、叙述技巧的雷同肤浅等。应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学发展中的这种“征候”，正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作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出现某种“写作焦虑”的表征；但是，更应该看到，这种“征候”和“焦虑”，存在着更深层的动机和“悖论”。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写，那是来自族群之根的强有力的召唤；另一方面，他们又言不由衷，在叙述中所指与能指总是产生断裂与分离。实际上，这种文学的“异质性”就在于：它一方面无时无刻、不得不去迎合权力的召唤，另一方面又要顽强地坚守着本族文化的堡垒，一边在忘却，一边又在建构。

在这里，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命题又一次被凸显出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汉语文学曾经蜕变成政治的附庸，用极为夸张热情的姿态投入在时代的话语建构中；而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却表现出对政治的有意疏远、迂回和回避。

这种差异，原因自有多样，但其中一个显要因素是写作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为主体民族的中国大陆作者，其文本被迫成为现时政策的图解者和附和者；而作为少数族裔的印度尼西亚华文作者，其写作却似乎成为内心的呐喊与心灵的图腾。它展现了政治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另一景色，并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政治的强大压力之下，文学还能如何起舞？

三 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表征

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特点是将文学文本视做一个社会文本，把它融入整个社会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社会文本，将之放置于整个印度尼西亚华人以及社会发展等互为联系的网络中加以透视，在互文性的语境中探究它的存在意义。

作为离散族群，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本身也是混杂多元与变动的。西方的、中国的、印度尼西亚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文化成分都融会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理念中。文学作为文化的集中体现，必然也表现出这种混杂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多元文化背景这一平台之上研究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这种文学在语言运用、意象构建、身份意识等方面的特点都能得到昭显。

首先，在语言运用上，混杂性语言的运用极为常见，汉语的非规范性运用也十分常见，形成了一种狂欢节式的语言。这种语言特色的出现，可能源于有意的想象，但更多是多种语言接触后的直接显现。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生活环境，一般都是多种语言——印尼语与华语，方言与土话、行话——混杂。尽管1965年的“九月风暴”后，官方限制华语的使用，但在雅加达、万隆等华人的集居地，在市场的交易中，在日常交往中，华语仍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它以一种躲躲闪闪的民间语言的形式存在，并

在与其他语言接触过程中不断变化,新的语法与词汇都在不断出现。身在其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人作家,不可能不熟悉这种民间意味极强的语言,因而在写作中可能有意无意地呈现出语言杂糅的自然状态,重现“语言广场”的喧哗。当然这种语言杂糅的缺陷是明显的,它使文本的纯粹性遭受破坏,对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华文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审美障碍,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呈现混杂性语言的“自我”,种族、地域、国家的森严界线得以跨越,印度尼西亚华人身份的自我言说呈现出未完成性和开放性。

其次,在意象构建方面,故乡与中国等传统意象也变得含混歧义,既有原根性,又有想象性与现实性。“故乡”的意旨,既可能是记忆中老一辈华侨的苦难乡土,也可能是现实中魂牵梦绕的印度尼西亚老家,既寓征了实体性的乡土也呈现了精神性的家园,既是精神动力又是乌托邦的幻象。在印度尼西亚华人欲说还“乱”的故乡想象中,幻现的是其本土化的艰难曲折;来自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使记忆变得含混模糊,现实变得狰狞无奈,在过去与现实中难以寻到一个不变的立足点。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有关“中国”的书写,自然难免与故乡融合,但它的独特性在于文本世界中,政治的、地理的中国与文化的中国脉络分明。经历了风雨之后,政治的、地理的中国已经逐渐淡出,除了少数老作家之外,它不过是一个观光地,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感觉有些亲切的别人的国家。而文化的中国却依然浮现在字里行间,在古典诗词、姓氏文化、伦理意识等符号化的碎片中隐约可见。尽管它也像拉康所说的镜像一样支离破碎,幻作枝叶,但并没有成为焦虑的源泉,引发排斥与争议。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古典中国”作为一种可以广泛吸收的文化营养,已经成为新生的华裔印度尼西亚国民的内在血脉,他们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并为实现其在国家文化中的积极转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冯世才的诗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改

用、移用最终铸造的是对于印度尼西亚母亲的深情。

第三，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华人的文化身份是不稳定的，它总在自觉不自觉中表现出自我肯定与自我质疑的多种声音。但其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那就是其文学想象总是围绕华人性与本土性、传统与现代两重纬度而摇曳变化。

1965年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华人族群一方面渴望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竭力迎合同化的去族群特性的政策，现实的焦虑使得文学想象中“悖论中的身份建构”成为不断重复的母题。对于本土性的确认，是通过塑造积极融入印度尼西亚历史洪流中的华人形象来完成的：战争年代，他们英勇杀敌、捍卫了国家利益；和平年代，他们乐善好施，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和谐。对“本土性”的书写，直接而强烈。而“华人性”的呈现，则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现。回忆中美好的华校生活，旧书摊上的一本华文书，一种从故乡移植的植物，一个早已作古的朋友或亲人，都能勾起他们对于华人传统的深切眷念。尽管在一些文本中华人性和本土性得到了暂时的统一，但更多的时候，华人的角色所表达的仍然是一种“继子”的感受——印度尼西亚华人意识与本土主流意识的撕裂和分化。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大量异族形象，也是华人身份自我言说的一种策略。它是在华人的双重需要与视角之上形成的。首先是本土化的需要。在这一视角中，下层原住民痛苦穷困的生活成为叙事重心，华人则作为正义的代表、爱心天使和支持者出现在他们身旁。这类“异族叙述”塑造了美好的华人形象，强调了他们与印度尼西亚的血肉交融，其“本土身份”的尴尬难题得到想象性的解决。但这种叙述却又是模式化、套话式的，叙述者是带着距离与隔阂去审视异族形象的，这些都无意中显示出华人对于异族的深层偏见。尽管这种偏见是历史造成的，也可

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战术，使华人在备受排挤的印度尼西亚保持着一种自尊与优越感，但是，这种内在的隔膜实际已是华人融入印度尼西亚社会的一种障碍。如何跨越这堵集体无意识的围墙，是华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一纬度则是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来审视那些在都市进程中成为受难者、被异化的异族，这些原本淳朴、善良、自由、快乐的人们，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中，或是被放逐到天边外，或是逐渐迷失自我、甘愿沉沦。这类“沉沦者”的异族形象寓征了华人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态度，表现出他们眷恋过去、渴望回归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社会的意识，也是华人追溯族群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的特别方式。而这两种视角往往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印尼华文文学中异族叙事的含混性、独特性。

黄东平是一个代表，他的文学创作横贯了华侨、华人与华裔三个文学时期。审视他的创作，我们能感受到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水乳交融、错综复杂。黄东平的历史叙述是对印度尼西亚华侨历史的形象性建构，他坚持以“咱们中国人”的身份书写时代洪流，自觉地为华人族群重建一个精神支点，这使得他的文学具备了华侨文学的鲜明特点——中国情结；但这种历史叙述其实也是对于现实巨变的一种激烈反应，在政治变动中失去“灵魂之家”的华人，更需要有一个不变的支点，让他们能在动荡不安的现世中“安好”。因此，在黄东平的叙述中，时刻激荡着时代风雨带来的激愤抑郁和惶惑痛苦，这使得他的历史叙述与华人身份的重建与暧昧性联系起来，从而带上华人、华裔文学的某种思想烙印——对印尼主流社会的某种呼应与抗争。

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能使我们对于作家背负历史包袱前行的艰辛有更为细致深入的领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大部分作家的潜在压力，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叙事策略呈现整体的

特色。如集体性的叙述风格、隐蔽感情的书写方式、轻柔的女性书写方式等。集体性的叙述风格表现为印尼华文写作者的个性风格不太突出，其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审美风格上却趋同一致，似乎是大写的“我们”而不是小写的“我”在回顾历史、关注现实。而在新、马华文文学中，尽管也呈现出某些整体倾向，但具有鲜明个性与审美风格的作家则层出不穷。隐蔽感情的书写方式源于政治压抑造成的含蓄与无言，印度尼西亚华人有着强烈的情感诉说冲动，但又往往不能直接表白，而是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手法来表现。因此，悲愤、痛苦的情绪在叙述中变成沉闷、低哑、无声的状态，也使得直接的批判与情感的倾泻成为幻觉。轻柔的女性书写方式，则表现为作家整体缺乏阳刚之气，从题材的选择、情节的设定、矛盾的处理、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表现出阴柔的感觉，缺乏厚度与重量，过于轻盈，很少有大手笔的作家作品。这些叙事策略，对印尼华文作家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但由此也使它站立在文学丛林中时显得有些纤细和分量不足。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在困境中舞动着自己的心灵之绸，镌刻出属于自己的话语，在这条异常艰辛的路上，印度尼西亚作家敞开的心扉，稚子的情怀，艰难的抉择，让面对它的人久久难以平静。